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上)

吴趼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上)

吴趼人 著

张友鹤 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下)

吴趼人 著

张友鹤 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吴趼人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7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ISBN 7-02-003275-3

I. 二… II. 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1421 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70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3.75 插页 5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42.00 元



吴趼人，即吴沃尧（1866—1910），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别号我佛山人。出身没落的官宦世家。早年至上海谋生，就职于江南制造局，常为日报撰文。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即应约写小说。后赴汉口主《楚报》笔政，但因该报乃英人所办，故“华工禁约”运动（1904）起后，即愤然辞职。1906年和周桂笙等创办《月月小说》，自任主笔。主要作品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瞎骗奇闻》、《恨海》、《发财秘诀》、《近十年之怪现状》及《黑籍冤魂》等。

丛 书 前 言

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是1999年中国文学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评选的发起者、组织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评选的创意堪称知机趁势，卓越宏大。评选以完全的公开性杜绝暗箱操作，数轮评选均邀记者监票，程序谨严，无可挑剔。评审委员会之构成坚持了学术的权威性、广泛性、代表性诸原则，果有群言一堂、和而不同之胜状。评选标准固然是以思想情趣健康、艺术特点突出为主，兼顾作品的开拓价值、代表地位及影响面，而评委们更是用历史的、发展的、整体的眼光来把握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共斟共酌中国社会百年之沧桑，重读重温中国文学百年之佳作，用理性和激情去擦亮一块块文学丰碑。评选出来的一百种优秀书目，其涵盖面远至世纪之初，广至台湾香港澳门，遍及一百年里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精当、丰富、全面、系统而且可信，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一时享有“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之美誉。

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自是入选作家的荣耀，同时也是广大读者的幸事。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图书汗牛充栋，当今数十位文学专家倾其心智，披沙拣金，平心切磋，优中选优，以集体的智慧开列出百优书目，受益者最终还是广大的读者。对于许多对中

国文学怀有美好情感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是布置了一座中国百年文学的画廊，供他们流连观赏；对于那些在中国文学的密林里寻幽探胜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在为他们披荆斩棘、指路导航，自然也节省了他们宝贵的光阴；至于对那些需要深究文学意义、把握文学规律的文学中人，百优书目则更像是在同他们坦诚地交换意见交流心得，于学术的精进将不无裨益——据我们所知，这份书目已经成为一些文学教授向学生推介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诚然，正如任何文学评选结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完全满意一样，百优书目也难免会引来仁者智者之见；我们只能说，入选者堪称优秀，而百种所限，肯定有优秀者未入其列。选择永远有缺憾伴随其后，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这是无庸讳言的。

然而，一批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专家毕竟开列出了“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的菜单，这总是激动人心、令人神往的。于是，把菜单变成美味可餐的盛宴，直接奉献给最广大的读者，又顺理成章地成了一批同样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出版人的宏愿。鉴于许多读者以各种方式表达了置齐百种图书的愿望，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南海出版公司以及北京图书大厦，决定协同行动，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重新出版。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射雕英雄传》、《家变》及《北岛诗选》未能列入重版，经几家出版单位协商，遂将终评排名紧随百种之后的《可爱的中国》、《尘埃落定》和《酒徒》补入。这样，百种图书中有小说 51 种，诗歌 23 种，散文 17 种，报告文学 2 种，戏剧 7 种。丛书书目按初版时间先后排序，附在每种书中；同时还附有复评委员和终评委员名单，让我们对评委们辛勤的工作保持长久的敬意。

丛书的每一种图书对所使用的版本做了精心选择，选择的

NAA46/66

原则是在尊重初版本的基础上从优择用,重版时仅对所用版本中明显的编校讹误进行修订;由于有些原版本篇幅较小,此次重版时适当地将作家的一些其他重要作品补录其后,当可满足当今读者的阅读需求。丛书统一装帧,典雅考究,成套配装,蔚为大观。可以肯定,这是一套图书馆必藏、藏书人必备、文学爱好者必读的大型丛书。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内容到范式也都堪称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文学。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永远以其划时代的意义和业绩彪炳千秋,烛照后世。那么,出版这样一套代表整个世纪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丛书,不仅是作家们的荣耀、读者们的幸事,也是我们文学出版人光荣而神圣的世纪使命。愿我们的工作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同在,于中国文学圣殿中占有永恒的一席。

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0 年 5 月

评 选 委 员 会

复评委员会

主任:杨匡汉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青	王必胜	白 焯	朱 晖	吴福辉
张同吾	张小影	李炳银	李敬泽	孟繁华
周政保	林为进	贺绍俊	杨匡汉	杨志今

终评委员会

主任:朱 寨 严家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孙玉石	朱 寨	朱向前	杨 义
杨匡汉	何西来	张 炯	严家炎	郑伯农
林 非	洪子诚	赵 园	谢 冕	谢永旺
雷 达				

丛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宏经 石 湾 任 超 任在齐 孙晓林
杨 雯 李昌顺 吴维月 张华燕 张胜友
陈浩增 周五一 胡守文 聂震宁 高贤均
程步涛

前 言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吴沃尧著，是一部著名的暴露封建专制制度末期政治和社会黑暗的小说。

这种暴露性的小说，在清朝末年义和团起义失败之后，盛行一时，第一部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接着就是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部代表作打开了道路，后来类似的作品，便风起云涌地出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面，把这种小说叫做“谴责小说”。他指出：清王朝自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以来，虽然先后镇压了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的起义，但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当中，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可耻的失败，暴露出这个腐朽的王朝完全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法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鲁迅先生把谴责小说的盛行，看作是当时人民对清朝政

府绝望后的鞭挞,这是非常正确的。清王朝对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就表明它决心顽固到底,对于温和的改良的要求也不能容忍。紧接着两年之后,清王朝又狡猾地利用了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义和团起义,借以排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而当帝国主义侵略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又无耻地出卖了起义的农民,在农民的血泊当中,实行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就表明清王朝乃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工具,为虎作伥的祸首。这样一来,中国人民面前便有了两份有力的反面教材,教导着一个革命的真理:清朝政府是“不足与图治”的,对付之道,只有“拊击”,干脆推翻它,消灭它。谴责小说便是作为“批判的武器”,出现在那样一个迫切要求着“武器的批判”的时候。

谴责小说里面,清王朝的整个统治机构及其统治下的整个上层社会,呈现出一片黑暗腐朽、肮脏丑恶的面貌。对于革命者和爱国者,对于一切想望未来相信未来的人们,他们可以借助于这种暴露,更清楚地认识敌人,增加对敌人的仇视、鄙视和蔑视,坚定胜利的信心。

可是,谴责小说也有严重的缺点。鲁迅先生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尖锐地批判道:“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他批判《官场现形记》道:“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又批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道:“惜描写失之张

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鲁迅先生所指摘的两点,一是不近情理、违反真实的过份夸张的描写;一是大量堆积、不加剪裁的千篇一律的题材,这些都是创作方法上的缺点,是同作家们政治思想的错误相联系的。

谴责小说的作者们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改良主义的本质是反动的。中国的改良主义尤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戊戌变法运动以前,在当时的条件下,改良派的变法运动还有进步意义。义和团起义之后,条件变化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了,改良派日益丧失了进步意义,反动的本质日益暴露出来。他们对封建制度有所不满,但依恋仍深,对帝国主义有一些“敌忾之心”,但幻想亦多。他们最害怕的还是人民群众,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始终反对。这样,他们就自陷于矛盾之中: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唯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他们的作品应该是针对封建制度的“批判的武器”,可是他们反对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武器的批判”。这样,他们当然不可能把“批判的武器”使用得好,不可能把那些黑暗和丑恶的本质深刻地揭露出来,为了加强效果,他们只好求助于大量丑恶故事的罗列,求助于不近情理的夸张了。

所以,谴责小说对于革命的、爱国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

读者，固然可以有积极的作用，如前所述；可是，对于别一样的读者，作用就很不相同。作者揭露了那样多的黑暗和丑恶，而对其莫可奈何，这就当然也可以引向妥协，正是所谓“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二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是从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前后到一九〇四年前后这二十多年。中法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中日战争后改良派发动变法运动失败。一九〇五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所以，本书所写的二十多年，恰好是一个段落，改良派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地进行改良的活动；同盟会成立以后，历史已是属于革命派的了。但本书实际写作时间，是在这二十多年的最末尾。那时，改良的希望早已破灭，新的革命高潮正在迅速到来，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是命在旦夕，无药可医。作者在那样的时候，回顾总结二十多年的历史，心情是悲凉的。他声称：“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第一回）他把一切黑暗和丑恶的现象，统称为“怪现状”，表明他已经很难理解这个世界。结末赞语道：“悲欢离合廿年事，隆替兴亡一梦中。”更是无可奈何，只好视同空虚的一梦。

但实际上，二十年的历史当然不会是一场梦，而“怪现状”也无非是垂死的阶级和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必然的现象。我们从大量堆积的“怪现状”当中，仍然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二十多年历史的面影。

这二十多年历史的开端，已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书中没有写到太平天国革命，可是，第四十回吴继之、文述农和“九死一生”三人填词题《金陵图》，不约而同地都写得凄凉哀怨，说什么：“几代笙歌，十年鼙鼓，不堪回首叹雕零。”说什么：“最销魂红羊劫尽，但余一座孤城。”三人词中，充满了“台倾”“馆寂”“鬼啸”“磷青”“荆棘”“铜驼”等类的字样。这些虽然表现了统治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仇恨和诬蔑，但也反映出伟大的农民起义对于统治阶级的打击的沉重。尽管所谓“同治中兴”大吹大擂，但统治阶级的人们只要一回顾这个曾经是太平天国革命首都的城市的历史，便不自禁其战栗和哀伤，哪里有真正的“中兴”的自信？

而况，太平天国革命尽管被镇压下去了，农民起义的浪潮仍然不断地在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更是给予封建统治以严重的打击。第八十回至八十一回写成都是一个江湖术士的骗局，竟然震动了全省的官僚，弄得“到处风声鹤唳”；第五十八回至五十九回写广州传来一个万寿宫地下有人埋炸药的谣言，把全城文武官员吓得神经错乱，都可见统治者虚弱和恐惧到了怎样的程度。

一部分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对于封建统治，起着离心作用和瓦解作用。本书的一个特色，是鲜明地把“做官”和“经商”对立起来，写“官场”不是人干的，而“商场”尽管也有“怪现状”，还是比“官场”干净。已入“官场”而坚决要出来的吴继之，未入“官场”而坚决不愿进去的“九死一生”，都有一条似乎很值得骄傲的道路可走；这道路不是《儒林外史》所指出的做隐士，也不是《红楼梦》所指出的做和尚，而是去“经商”。

这种商人，不是封建社会中一向为贵族官僚士大夫所鄙视、自己也很自卑的“市侩”，而是公然以“经商”的身分自豪，傲视做官，傲视科举，傲视一切假名士和滥文人，正在通过商业资本的途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这种社会力量，正是改良主义的基础，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当中，还是第一次出现。

封建皇朝自己早已腐朽，受着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又有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对它起着离心和瓦解的作用，促使它更加腐朽，更加动摇。这样的政权，当然不可能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第十四回写南洋海军整个系统内上下成风、朋比为奸、无孔不入的贪污，把战斗力腐蚀干净了。中法战争时，取远号兵轮的管带，远远看见海上一只船，疑心是法国的兵船，逃走都怕来不及，自己开放水门将船沉下，大家乘了舢板逃命，而事后捏报“仓卒遇敌，致被击沉”云云。中法战争当中，清朝的南洋海军就是这样覆没的。可是十年之后中日战争当中，清军在朝鲜平壤的失败，情形就更为可耻。第八十三回写叶军门在平壤被围，公然亲笔写信给日军方面，请求日军“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这样地通敌乞怜、放弃守土之后，又“捏报了败仗情形，分电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那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件事”呢！

贪污的毒菌，不仅腐蚀了国防力量，而且侵入了统治机构的每一毛孔。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统治者对金钱的无餍的追求。皇朝命在垂危，大小官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中，除了抓紧每一个机会最大量地攫取金钱财货而外，什么也不关心。

上自“老佛爷”(慈禧太后)、王爷、中堂、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未入流的佐杂小官,宫里的大小太监,官僚的幕客、家丁、差役、马弁、姨太太、小姐、丫鬟、仆妇,全都撕下了各种假面具,赤裸裸地当强盗、骗子、小偷,当乌龟王八、变童娼妇,只要能够弄到钱,只要能够取得更高的地位去弄更多的钱。而这种追求金钱的大疯狂,归根到底,就是对人民的敲骨吸髓的榨取,就是国家主权、土地、资源的大拍卖。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善棍、赌棍、买办、讼师、江湖劣医、人口贩子、外国“冒险家”,……都是直接间接依附侵略者统治者的,相互勾结,相互竞争,一起来吮吸人民的血汗。“九死一生”说:“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第二回)指的就是这些现象。

鲁迅先生引了“九死一生”的这句话,接着就说:“则通本所述,不离此类人物之言行可知也。”我们从鲁迅先生的话,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作者的眼里,只看到这些“怪现状”,只看到这些蛇鼠、豺虎、魑魅之流为害人民,污浊社会,摧残国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腐朽没落的垂死面貌,但是看不见人民的力量。当时的人民,并非不声不响、帖帖服服地听凭那些东西吸血,而是正以熊熊的怒火在烧除它们。那些东西的无耻和疯狂,不是表现它们的强大,正是表现它们的垂死的挣扎。事实上,它们已临到被澄清和扫荡的时候。而作者竟看不见这一点,这就使作品沉溺于“怪现状”的演述之中,而缺乏击中要害的批判力量。